

## 中东地缘政治

## “1·25革命”前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

范鸿达 岳非平

**摘要：**“1·25革命”后，埃及的政治转型一度为中东政治发展带来一丝曙光，但之后更剧烈的社会动荡又为民主转型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在西方民主转型理论的诱导下，埃及的民主化走向误区具有必然性，西方民主转型理论注重即时性的结果，片面地将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公民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的实现视作民主转型的终点，而忽视了民主的深刻内涵。民主某种程度上就是各种公民权利，包括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依次实现的漫长过程。三种权利互相支撑，构成三位一体的民主。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主转型缺乏基础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支撑，最终导致民主的空心化。革命后的埃及尽管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公民权利的匮乏对民主的成熟构成严重制约，从选举到善治，埃及的民主转型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1·25革命”；政治转型；公民权利

**作者简介：**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岳非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4-0026-14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T2013221008）之阶段性成果。

2011年的“1·25革命”虽然赋予了埃及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遐想，但在过去的三年里，埃及的政治现实是社会分裂、街头和暴力冲突盛行、民选总统遭黜、经济滞后、民生惨淡以及新政治强人诞生，其未来的政治发展令人担忧。美国学者奥唐奈和意大利学者施密特曾对威权统治转型的“不确定

性”进行过阐释，认为民主政治、新的威权统治甚至暴乱都可能成为威权政治转型的结果，他们为民主转型勾勒出的路线图是：专制政权开放—协商—公民社会复兴—召集选举。<sup>①</sup>似乎按照上述步骤就能顺利实现民主，而民主选举则标志着自由民主的胜利。

但埃及既往三年的发展证明，其政治转型远远不是几次民主选举能决定的，低迷的参选率充分印证了选举在埃及民众心目中的分量。对于民主，要么消退对其歇斯底里的狂热，降低对它的期望值，要么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否则民主就有可能制造更大的麻烦。本文拟首先探讨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局限性，进而从历史与现实出发，结合埃及的案例探讨西式民主与埃及社会现实的内在张力与激烈碰撞，并全面检视当代民主应当具备的价值内涵。

## 一、关于政治转型的理论探讨

政治转型是比较政治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以及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转型理论，其意旨都是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在西方学者的眼中，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民主政治。不论是政治发展理论还是民主转型理论，其关注的都是当下的转型是否结出了“民主”果实，至于民主如何在长期的历史环境下成长及民主应当具备的内涵，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政治发展理论抱持一种乐观主义心态将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都纳入西方的民主模式中。现代化理论有三大假设：“一是‘分类假设’，政治发展范式将全世界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三个世界’；二是条件假设，即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三是单线进化论，即社会进化是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sup>②</sup>但政治发展论者很少真正关注后发国家的历史传统，他们关心的是这些国家能否按照西方的模式通向自由与民主，一些学者甚至有意忽略其母国长达数百年的民主成长史，并用一些表象性的因果联系去解释其政治发展，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支）中“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著名论断即是如此。<sup>③</sup>该论断将

① 参阅[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景威、柴绍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6章。

② 王金红、黄振辉：《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当代民主化进程的范式转移》，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第87-89页。

③ Seymour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Vol.53, No.1, pp.69-105.

解释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是如何带来民主的，而民主则仅仅被视作一个输出终端。

现代化理论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民主的产生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二战之后，经济发展不能带来民主或不能为落后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证明经济发展只是促成民主的诸多因素之一。由于民主的成长历程是漫长的，而历史的多样性又决定了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因此现代化论者的选择性失明常常导致他们在将理论套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时往往会落空；其二，现代化理论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民主的内涵几乎被掏空，民主只是检验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刻度，而民主本身却未成为被检验和反思的对象，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未予厘清，这加剧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不适”的症状。

民主转型理论摒弃了线性史观，更加强调政治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精英博弈在政治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转型论者否认静态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决定性作用，“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sup>①</sup>。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只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展水平与民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转型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会成功完成转型”<sup>②</sup>。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普沃斯基驳斥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内生关系，认为民主可以产生于战争、经济危机、独裁者死亡等偶然因素，民主可以在任意的经济水平上发生。<sup>③</sup>其次，民主转型理论强调精英的作用，认为民主转型是精英博弈的结果。奥唐奈与施密特认为在政治转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结构”，而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博弈。<sup>④</sup>

尽管民主转型理论的解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但是仅仅知道政治转型具有不确定性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民主转型理论的框架下，民主的内涵被进一步掏空，选举被众多学者视为衡量民主转型的终点，美国学者戴蒙德认为衡量

---

①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第2页。

② 王金红、黄振辉：《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当代民主化进程的范式转移》，第91页。

③ 转引自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8页。

④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第2-4页。

民主的基本准则是“经由定期的自由公正的选举”，<sup>①</sup>林茨和斯泰潘认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sup>②</sup>但是学者们很快就发现理论和现实格格不入，威权统治者既可能真心推行民主，也可能利用选举改善威权政权的形象，美国学者托马斯·卡洛瑟斯(Thomas Carothers)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主的“灰色地带”(Grey Zone)，即既非完全的专制，又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sup>③</sup>一时间出现了“有选举而无民主”、“虚假民主”、“选举性威权体制”、“竞选性威权体制”、“混合政体”等等说法。<sup>④</sup>

基于对民主回潮现象的反思，学者们又提出“民主巩固”的概念，尽管超越了“民主=选举”的偏狭观念，但民主的内涵仍然局限于政治或制度层面。亨廷顿提出“政权两次易手”原则，即“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以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做已得到巩固”<sup>⑤</sup>，这实际上仍将选举视作衡量民主的标准。林茨和斯泰潘提出了民主巩固的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和经济社会。<sup>⑥</sup>这一定义虽然从更宽广的层面定义民主，但它仍然将建立民主制度定位为政治转型的终极目标。

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局限性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检讨和反思，杨光斌认为当代

①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②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③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January 2002), pp. 5-21.

④ See Richard A Joseph, “Africa, 1990—1997: From Abertura to Clos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9, No.2(April1998), pp.3-17; Andreas Schedler,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2(April 2002), pp.36-49; Steven Levitsky, Lucian A Way,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2(April 2002), pp.51-64; Larry Diamond, “Election without Democracy: Think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2(April 2002), pp.21-34.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1页。

⑥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欧洲》，第14页。

比较政治学现正处于一种“丰裕中的贫困”，原因在于“目前的民主化研究属于典型的‘即时性结果’，即‘同步的因果分析’”，一方面缺乏深入的回溯性分析，难以厘清民主转型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化终点的认知又略显武断，民主制度的确立就意味着民主化的胜利了吗？<sup>①</sup>美国学者福山曾标榜自由民主制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结果遭人贻笑。事实上，“民主化研究不能停止在民主如何巩固这样形式性的问题上，而应该追问民主与治理之间的本质性关系”。<sup>②</sup>民主不应局限于工具性的制度层面，还应关注其所蕴含的理性价值，如人权、稳定、秩序、福利、公平、正义……没有这些价值的支撑，民主制度也就丢失了灵魂。在当代社会，善治就已经超越具体的制度，为民主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

## 二、“1·25”革命前埃及政治转型分析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欲解开当下埃及的民主迷思，就必须回溯其历史。埃及共和国是典型的军人主政的威权主义国家，但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1·25革命”之后才开始的，萨达特时代开放党禁标志着民主化的开端。穆巴拉克在位期间，加快了民主化进程。2005年，正值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小布什点名要求埃及加快民主化<sup>③</sup>。但是，经过几十年“改造”的埃及依然深患“民主匮乏症”，民主制度与威权主义以奇特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选举沦为穆巴拉克装点政治合法性的外衣，却没有为民众带来多少民主红利。

埃及的民主化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宽松多党制度初步成型、议会与选举制度逐步规范、司法独立性大大提高、公民社会日益扩大等等。<sup>④</sup>但是，埃及的民主转型靠的是外力推动，而非内力驱动，缺乏坚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根基的民主制度并未给民众带来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利。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历程都是漫长的，而这个历史过程又是分阶段的。民主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并非难事，“随着民主在各大洲的传播，它已发展成一种全球性现象，今

---

① 杨光斌：《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载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② 同上。

③ Yoram Meital, “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 the 2005 election”, *The Middle East*, Vol.60, No.2(April, 2006), p. 264.

④ 岳非平：《埃及威权政体转型研究（1952-2011）》，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政治系，2000年，第44-52页。

天，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的大约 3/5 是民主国家”<sup>①</sup>。但是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充斥着大量失败国家的案例，缺乏历史积淀的民主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福祉。

何为现代国家？在学者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即无外乎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两个基本条件”<sup>②</sup>。而公民权利又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标志。尽管现代国家仍需重视国家权力建构，但“国家权力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目的是其疆域内公民的福祉”<sup>③</sup>。只有产生了公民权利的概念，才可能衍生出民主，民主正是由一系列公民权利所组成。欧美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多是以发布文件宣告公民权利为标志，如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公民权利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那么公民权利有哪些基本组成部分呢？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公民身份概念包括公民的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sup>④</sup>基础权利指公民的法律权利或曰民权，包括生命权，思想、言论、信仰、结社、活动自由，财产权，国籍权，法治和司法行政的权利等；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政治、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主要体现为普选制、多党制与议会制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社会权利通俗地讲就是指民生，包括公民享有经济福利、平等的机会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文明生活方式的权利。<sup>⑤</sup>上述三种权利是分阶段实现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基础权利得到保障为前提，只有公民的基础性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公民才能享受更多的社会权利。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历史证实了上述判断，在自由民主制度完善之前，民众为争取基础权利经历了长期的抗争，而福利国家建设则是在民主制度较为完善之后才开始的。用西方国家现成的民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品头论足显然有失公允。

埃及的民主化进程违背了上述规律，直接跃进至政治权利。穆巴拉克意在通过解决政治参与危机，赋予政权“民主的合法性”。但是在公民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形下，民主制度的建立能否真正解决参与危机？事实证明，穆巴

①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前引书，第 51 页。

② 曾毅：《“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内在张力》，载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第 1 辑），第 72 页。

③ 同上。

④ [英] T. 马歇尔、吉登斯：《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中华、刘训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⑤ 关于各项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参见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载 [英] 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1 页。

拉克与民众很快就分道扬镳，民主制度沦为装点威权统治的橡皮图章。

人权的匮乏为穆巴拉克操纵民主留下极大的余地。由于缺乏结社自由，成立政党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诸如穆兄会这样强大的政治派别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而政党的弱小使得穆巴拉克能够从容地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许意识形态和利益截然不同的政党同时存在，“造成反对党之间的分裂，为统治者限制反对党之间的联合制造了最大化的空间”<sup>①</sup>。因此，“反对派的存在不但没有对政权产生太大威胁，反而赋予政权合法性”<sup>②</sup>。由于缺乏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穆巴拉克敢于制定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例如他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恢复《紧急状态法》，政府可以任意逮捕持异见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加以监禁。

人权匮乏是埃及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2010年6月6日，亚历山大的警察粗暴执法，将一名叫哈立德·萨伊德的生意人在网吧打死。萨伊德之所以遭此横祸，据说是因为他手上有警方人员收缴毒品之后迫不及待分赃的录像。此举引发民众的强烈愤慨，事实上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民众抗争已经风起云涌。2004年，一个名为“凯飞亚”（Kefaya）的草根组织成立，组织名称意为穆巴拉克的统治已经“够了”，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sup>③</sup>埃及人对于做人起码尊严的渴求远远超过对政治权利的追逐。

在基础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断层的情况下，埃及民众的社会权利状况也很糟糕。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埃及经济发展迅速，2006~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以上，被列入“金砖国家之外的新钻十一国行列”<sup>④</sup>。但是，经济繁荣表象的背后是民生多艰，庞大的埃及人口陷入绝对贫困，比例从2000/2001年度的16.7%上升至2008/2009年度的23.4%。<sup>⑤</sup>高人口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进一步加剧

---

① Daniel Brumberg,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4, (October 2002), p. 61.

② Holger Albrecht, “How can Opposition Support Authoritarianism? Lessons from Egypt”, *Democratization*, Vol.12, No.3, (June 2005), pp. 379-380.

③ “凯飞亚”是埃及变革运动（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组织的绰号，阿卜杜·贾利勒·穆斯塔法（Abdel gelil Mostafa）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是一个草根组织，在“1·25革命”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主要反对穆巴拉克试图连任总统、扶持其儿子加麦尔·穆巴拉克继承总统职位、政治腐败和经济停滞、暴政、压制和对人权的漠视等。参见 Wikipedia: Kefaya,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faya>.

④ 安维华：《埃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19页。

⑤ Maria Paciello, “Egypt: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PRO Technical Report*, No.4, (May 2011). p. 7.

了社会贫困。埃及人口增长迅速，从 1960 年到 2010 年，埃及人口从 2,790 万激增至 8,112 万，经济增速赶不上人口增速，就业空间有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推进，埃及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维持在 10% 上下，截至埃及发生“1·25 革命”前的 2010 年，失业率仍高达 9.4%。<sup>①</sup> 社会福利的削减也加剧了贫困问题，埃及政府减少了公共服务和补贴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政府对原本免费的公共服务实行收费，比如“教育不再是免费的，教育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从 2002 年的 19.5% 下降到 2006 年的 11.5%，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由 5.2% 下降到 4.0%”。<sup>②</sup>

二战后，埃及尽管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在第三世界中仍较有影响力。埃及一度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埃及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一些东亚、拉美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埃及周边的一些产油国也利用能源优势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发财致富，而埃及经济则处于停滞状态，人均 GDP 与上述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见表 1）。到 2010 年，表 1 中除埃及外，其他国家的人均 GDP 均超过或接近 10,000 美元，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而埃及则只有 2,804 美元，仍是中低等收入国家。与经济发展落后相伴的是，埃及人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见表 2），这种差距必然对埃及人的眼球产生强烈撞击。这反过来导致民众对政治玩世不恭，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关心选举。

表 1：二战后部分亚非拉国家人均 GDP 比较（单位：美元）

GDP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韩国	92	279	1,674	6,153	11,347	20,540
新加坡	449	925	4,913	11,845	23,815	42,784
阿联酋		27,632	42,962	28,066	34,476	34,049
卡塔尔		2,760	34,990	15,446	29,914	71,510
智利	600	938	2,463	2,388	5,133	12,685
沙特	781	864	16,692	7,206	9,354	19,327

① 埃及人口和失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011 年公布数据，详情参见世界银行关于埃及的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ublic>。

② Maria Paciello, “Egypt: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p. 9.

③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墨西哥	354	671	2,763	3,052	6,664	8,885
巴西	203	441	1,931	3,087	3,694	10,978
土耳其	284	491	1,567	2,791	4,220	10,135
埃及	151	211	510	766	1,510	2,804

表 2：2010 年部分亚非拉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HDI) 比较

	HDI 位次	人类发展 指数值	出生时预期 寿命 (岁)	平均受教育 年限 (年)	预期受教育 年限 (年)	人均国民收 入 (美元)
韩国	12	0.877	79.8	11.6	16.8	29,518
新加坡	27	0.846	80.7	8.8	14.4	48,893
阿联酋	32	0.815	77.7	9.2	11.5	58,006
卡塔尔	38	0.803	76.0	7.3	12.7	79,426
智利	45	0.783	78.7	9.7	14.5	13,561
沙特	55	0.752	73.3	7.8	13.5	24,726
墨西哥	56	0.750	76.7	8.7	13.4	13,971
巴西	73	0.699	72.9	7.2	13.8	10,607
土耳其	83	0.679	72.2	6.5	11.8	13,359
埃及	101	0.620	70.5	6.5	11.0	5,889

埃及的案例表明，民主转型的实质是逐步实现公民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漫长过程，甚至实现了上述三种公民权利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就大告成功了，时代在进步，民众对权利的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民主也随之更具包容性。因此，民主的内涵并非现有的民主制度所能涵盖，建立民主制度只是民主转型的必然过程，而非民主转型的终极目标。那么，比照穆巴拉克时代，革命后的埃及是否已经具备了实现民主的条件了呢？

### 三、“1·25 革命”以来埃及民主转型的路径分析

“1·25 革命”后民主转型几乎成为埃及民众的共有心声。兴议会、选总统、制宪法，各式选举接踵而至，美国政府对穆巴拉克的倒台经历了短暂的震

① 2010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10/>。

惊、观望和迟疑后，转而期望利用这场草根革命继续推销其自由民主价值。但是，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民主亢奋过后，民众对于民主的态度趋于冷淡，一些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代的“稳定”，渴望出现新的政治强人拯救已经千疮百孔的埃及，他们甚至在宪法公投的选票上对未曾执政一天的军方领导人塞西写下“我爱塞西”、“塞西是总统”的字样。<sup>①</sup>埃及式民主不得让我们产生诸多疑惑：西方民主模式究竟有没有普适性？当前埃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民主选举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公平等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吗？面临社会撕裂的埃及，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掌舵，重回威权主义时代吗？

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相仿，埃及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先着眼于政治权利，或者说先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确，民主作为一个古老的政治词汇，“其原意指民治的政府，源于古希腊语‘demos’（民众的）统治”。<sup>②</sup>由人民行使统治权力是民主的基本标志，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成就在于由人民定期选举统治者。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西式民主制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即使是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也并非限于“民治”这层含义，有资格参与统治的公民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取得公民资格，享有基本的人权，妇女和奴隶是没有资格参与民主的；二是要有充裕的闲暇和财富，苦于劳作的人同样没有资格奢谈民主。

基础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民主，事实上，美国总统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演说可谓民主内涵的全面表述，中国近代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表达了相同的民主理念。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民主的含义局限于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其结果往往是由民主转型走向民主崩溃甚至国家失败。即便是西方的成熟民主国家，也面临着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所说的“再民主化”问题，近段时间美国的斯诺登事件和窃听丑闻表明，发达国家的人权状况并未如其鼓吹的那般美好；而金融危机下的华尔街民众抗议运动则表明民众已经不满足于形式上的“政治民主”与“生而平等”，而转向追求更实质性的“经济民主”与公平正义，分配危机已经直接关涉到民主的“合法性”问题。

埃及的民主困境亦在于精英与民众只看到了民主的政治维度，而未看到人

① 郑一晗：《埃及选票被写上了“我爱塞西”》，载《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2月7日，<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4/0207/343981.shtml>。

② 参见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权和社会维度，结果对政治权利的争取变成了对政治权力的相互倾轧。“1·25革命”后埃及民众的人权状况有多大改善呢？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up>①</sup>公布的2012年年度报告中，埃及在公民自由（包括表达和信仰自由、结社权利、法治水平、自主性和个体权利等基本人权）一项的得分是5分。虽然较之前些年略有进步，但是人权状况仍然堪忧。穆尔西上台后推行保守的伊斯兰化政策，妇女一度重新戴上面纱；2013年8月，穆兄会成员因不满军方对穆尔西实施政变而进行大规模街头示威，军方遂对抗议的穆兄会成员实施暴力清场，造成数百人伤亡；2014年3月，埃及一家刑事法院判处529名穆兄会成员死刑。上述现象引发了国际国内人士对埃及人权状况的深切担忧。在刚过去的这三年中，埃及政府的治理状况和社会民生又有多大改善呢？埃及财政部发布的2014年1月月度经济报告表明，2013/2014财年前三个月埃及经济增速仅为1%，这与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差之甚远；数据还表明，投资和旅游业很不景气，2013年7月至9月，投资同比下降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8个百分点，而作为埃及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的贡献更是低至负0.9个百分点；超过12%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的失业率及仅为17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为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及民生改善蒙上了阴影。<sup>②</sup>穆尔西执政后对民众许下了许多美好的承诺，并推行了诸如“百日计划”等振兴经济的政策措施。但由于穆兄会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穆尔西忙于聚敛权力和政治斗争，光鲜的承诺和空洞的政策措施没有转化成相应的治理成果，民众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和实惠，逼迫他们继续“革命”，这显然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也表明，仅靠民主选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处境，也不能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政治蓝图，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民粹主义和街头政治的泥沼。

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要冲破民主迷失，就必须扩大民主内涵，抑或用一個更全面的概念来取代流行的狭隘民主观念，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

① 自由之家组织是每年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评分，并发布年度报告，两项指标的得分从1分（最自由）到7分（最不自由）。通过不同的得分等级，将国家区分为“自由”（Free）、“部分自由”（Partly Free）、“不自由”（Not Free）三种类型。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得分的平均值决定了一个国家总体的自由民主状况：自由（1.0-2.5分），部分自由（2.51-5.5分），不自由（5.51-7.0分）。2012年报告参见 Wikipedia: Freedom in the world,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in\\_the\\_World\\_\(report\)#Middle\\_East\\_and\\_North\\_Africa](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in_the_World_(report)#Middle_East_and_North_Africa).

② 以上数据均来自新华网报道：《财经随笔：埃及经济复苏前路漫漫》，2014年2月12日，<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212/346566.shtml>。

的现代化。治理是与统治相对的，它不将民众视作被统治的对象。治理既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关心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共治，也强调提升政府能力，为民众谋求更大的福祉，归结起来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因此，治理概念涵括了广义民主的深刻内涵。民主选举固然是现代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政治选择的一种手段，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规范、透明与合法，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但选举本身不能直接为民众带来福祉。因此，民主选举只是民主转型链条上的诸多环节之一，从选举到善治，埃及的民主之路仍将漫长而崎岖。尽管治理理念最大化地提升了民众的地位和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治理最终是由政治精英尤其是执政者来推动的。能够带来良好治理的政治精英应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获得民众的认可，获得高度的政治权威；二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备高超的治国理政的才能。选举的功能仅限于前者，即赋予执政者合法性，树立其政治权威。但是穆尔西的尴尬结局表明执政者的政治权威不仅有赖于民主选举的认可，更依赖于执政者自身的强大。在经历了民主实验失败的苦涩滋味后，“稳定”与“权威”成为埃及政治的高频词汇。政治作风强悍的前军方领导人塞西满足了民众的脾胃，民众为他发动的军事政变及随后一系列的反恐措施拍手称快，认为他的铁腕为埃及带来了稳定与秩序。在 2014 年 5 月的总统大选中，塞西如愿以偿，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对手当选总统。尽管选举远非完美（此次只有两位候选人，且投票率不高），但塞西当选的确是众望所归。

用民主的手段选择一位政治强人，这一现象折射了埃及人在失序状态下的复杂心态。而塞西执政后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也可能是错综复杂的，积极方面，一是塞西的个人权威和魅力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减少派系纷争，有利于政治的平稳过渡，为日后的社会经济改革扫清障碍；二是以军方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与军方协调一致，塞西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三是塞西当选有利于取得美国和周边国家对埃及的认可和援助，为改革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存在的不利因素是，首先，塞西的政治权威不是绝对的，埃及的利益格局和政治观念仍高度分化，尤其是有着 80 多年历史的穆兄会几经沉浮，极富韧性，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塞西能否包容持异议者，并应对他们的冲击，仍是一个问号；其次，塞西在军营待了大半辈子，没有地方主政的经验，带兵打仗和治理国家毕竟是两回事，塞西治国理政的才能仍有待实践的检验，尤其是他能否超然于军方之上，免受军方的权力绑架，从而平衡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这是其执政成败的关键；最后，塞西能否在民主与权威之间拿捏好也极大地考验着他的政治定力和执政艺术，

实现民主权利、政党政治多元化、议会选举规范化是塞西必须予以兑现的，埃及民众已经具备基本的民主素养，政治强人情结并不意味着他们心甘情愿忍受专制独裁，穆拉巴克和穆尔西就是最好的注脚。

当然，不论塞西能否带来繁荣与稳定，埃及人民都不能轻视这三年所取得的政治进步，不可忽视民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奠基性作用。单纯地寄希望于政治强人普施恩泽，这固然体现了某种朴素的民生观，却违背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规律，最终必然又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穆巴拉克时代高压下的稳定和秩序在未来的某段时间可能会被怀念，但本质上类似中国古人的追慕尧舜，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不是希望回到过去”。<sup>①</sup>的确，当前的埃及需要强势的政治人物掌舵，并在此条件下走一条民主发展与强人政治并存的转型路径，但向民主转型应当成为主旋律，复辟权威主义将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和代价，政治强人必须以尊重民意为基础前提，以善治为最终归宿。

#### 四、结语

本文结合民主转型理论与埃及民主化的案例，意在廓清民主的内涵。民主既有政治层面的内涵，也有法律、社会、经济层面的内涵，民主事实上体现为各种公民权利的实现。然而，很多人——包括学者在内——将民主局限于制度层面，尤其将民众参与选举视为民主的象征与标志，埃及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浅薄。将道理说清楚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将深思熟虑的理念付诸实施，这包含两个方面：如何既不违背人类民主历史的发展规律，又能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政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两个方面存在着张力：一方面，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西方国家的大力鼓吹使得后发国家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几百年的民主历程，于是，移植民主成为最省时省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民主的发展是分阶段的，犹如生命的发育并非一蹴而就，盲目的模仿和跃进只能让民主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的确，民主是现代国家共有的应许之地，但如何抵达、怎样抵达却各有路径。因此，后发国家在民主化征程中既要坚定信心，又要主动掌握民主的话语权，如此才能找准民主转型的方向。

---

① 王猛：《埃及：需要给理想一点时间》，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3期，第53页。

#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gypt's Political Transition around the 1·25 Revolution

FAN Hongda & YUE Feiping

(Fan Hongd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ublic Affairs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Yue Feiping, Ph.D Candidate of Public Affairs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1.25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Egypt brings hope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iddle East. However, the serious social turmoil brings giant uncertainty to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of Egypt. Actually, traditional western democratic theory inevitably misleads Egypt's democratization to a myth, because it excessively emphasizes immediate results, unilaterally take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especially vote right as the terminal lin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on the contrary, it overlooks democracy's profound meanings. In some extent, democracy is a lengthy process that realizes different civil rights one by one, including basic right, political right and social right. These three kinds of rights sustain mutually and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Mubarak era ignore the basic law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ndow some limit political right to citizen, but the lack of basic right and social right ultimately cause a hollowing out of the democracy. Although post-revolution Egypt has got some substantial progres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still severely restricts democracy's maturity. From election to good governance,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of Egypt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Key Words** Egyptian 1.25 Revolution; Political Transition; Civil Rights

(责任编辑: 杨 阳)